

THE VERTIGO YEARS

CHANGE AND CULTURE IN THE WEST
1900—1914



晕眩年代

1900—1914 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20 世纪早期的欧洲：一个漂浮不定的世界，一个期待新事物却又恪守传统的矛盾交织时代。当时的主要议题是：恐怖主义、全球化、移民、消费主义以及道德价值的坍塌和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

[德] 菲利普·布罗姆 / 著
彭小华 /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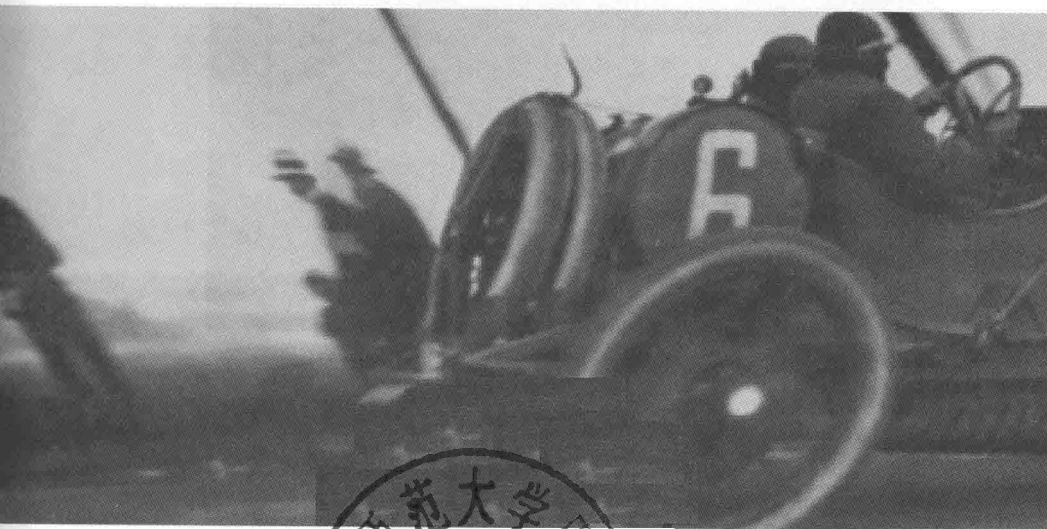


四川人民出版社

THE VERTIGO YEARS

CHANGE AND CULTURE IN THE WEST

1900—1914



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德] 菲利普·布罗姆 / 著

彭小华 /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

[德] 布罗姆著；彭小华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1

ISBN 978-7-220-09750-8

I. ① 晕… II. ① 布… ② 彭… III. ① 社会发展史—研究—西方国家—1900~1914 IV. ① K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316874号

四川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让字21-2016-33

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德] 菲利普·布罗姆 著 彭小华 译

责任编辑
责任校对

吴焕姣 江 澄
袁晓红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2号)
<http://www.scpph.com>

E-mail

sichuanrmcbs@sina.com

新浪微博

@四川人民出版社官博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 86259457 86259453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457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

成品尺寸

155mm × 230mm

印 张

24.75

字 数

350 千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220-09750-8

定 价

59.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 86259453

目 录

引 言.....	1
一 1900 年：电机与处女	3
二 1901 年：更换卫兵	19
三 1902 年：俄狄浦斯王	38
四 1903 年：奇异的冷光	61
五 1904 年：皇帝陛下和莫雷尔先生	81
六 1905 年：冲天怒气	108
七 1906 年：无畏舰与焦虑	139
八 1907 年：梦想与愿景	172
九 1908 年：女士们的石头	198

引 言

他们——主要是男人和男孩——满怀期待地站在绿树成荫的乡村道路边。夏日的炎热毫不留情地包围着他们。他们极目张望向前延伸的道路。听得见一阵微弱的嗡嗡声。一辆汽车出现在街道之间笔直的路上，汽车小小的，周围扬起一片灰尘，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汽车变得越来越大。它向观众冲过来了，强大的引擎使其极速行驶，呼啸声越来越响亮。这是一种富有力量的感觉。

其中一个旁观者，一位 18 岁的青年，做好了等待已久的拍照准备。汽车离得更近了，呼啸着，动力十足地行进着。几乎就在眼前了。青年摄影师专注地透过镜头观看着。他清楚地看见巨大的挡风玻璃后面的司机和他的乘客，看见用油漆写在油箱上的数字 6，当汽车从他身边一溜烟冲过的时候，他感觉到噪声和动力的冲击波。在那一刻，他按下了快门。此时，灰尘包围着他。他必须等一等才能看照片的效果。

当他看到自己在 1912 年 6 月 26 日那天在法国汽车大奖赛上拍下的照

片时，年轻的摄影师感到很失望。照片中的6号车只有一半车身，背景模糊，有一种奇怪的放大感。他把照片收起来了。他就是贾奎斯·亨利·拉蒂格。他认为拍失败的这张照片在40年后展出，并使他一举成名。照片充分体现了匆忙、活力、快速，在世纪之交到1914年秋天之间的那些年，这些非常重要。

今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那个时期经常被认为是平和欢畅的：陷落之前的日子，过去的美好时光，装饰华丽的电影赞颂的美好时期，一个即将被冷酷地驱往灾难的、被暴力砸碎的美丽、完好无缺的社会。根据这种对各种事件进行解读的方式，1918年后，现代性的凤凰涅槃于旧世界的灰烬。

对于生活在1900年前后的大多数人，这种强调可靠性和优美的怀旧观点会让他们感到惊奇。他们对这个时期的体会尚未被回忆修饰。他们的体会更加原汁原味，具有更接近我们这个时代的魅力和恐惧的特点。如同现在一样，那时，技术、全球化、传播技术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人们的交谈和报纸文章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如同现在一样，那时，大众消费文化给时代打上了烙印；如同现在一样，那时，生活在一个加速的世界的感觉和进入未知的感觉令人心慌意乱。正因为此，拉蒂格的照片特别适合作为那个时代的象征。作为一个热爱快速汽车和速度的男孩，他所关注的事物反映了时代的关注，其时，赛车手是大众英雄，新的速度纪录每周都在创造和打破，大规模生产——在这里体现为手提相机，改变着每个人的生活。

速度既可以是令人恐惧的，也可以深深地激动人心，这种恐惧和变化的投射也发出了跨世纪的回声。

一 1900 年：电机与处女

各位先生、女士，这是美丽的 1900 年世界博览会。你将莅临现场，你已经踏上未来的旅程，你已经光临现场。你置身于巴黎；如同梦幻一般，你远远看见世界博览会的屋宇，它们高耸于这座伟大城市的云霄之巅。你应当采取哪一种参观方案？从哪里开始？

——摘自 1900 年世界博览会官方指南

一个简单而痛苦的问题应该占据全体法国人的头脑：“我们怎么能够阻止法兰西烟消云散？怎么能够保持法国民族在地球上的存在？”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之外，其他一切都消失不见了……

——雅克·贝迪永《法国人口下降》

她像个怪物，也奇异地富于预言性：她，一个高 20 英尺、体态丰满的资产阶级女人，矗立在新世纪开端的 1900 年巴黎世界博览会大门前。

在海军节上，她与体现出惊人自信的战舰一起扬帆前进，这座穿着时髦服饰、隐喻巴黎市的石膏塑像看起来像是个专横的女人，陪伴着她被宠坏的女儿路过老佛爷百货公司：她胸部丰满，一副匆忙、傲慢的样子。你似乎听得见她正对着胆小羞怯的售货员高声发号施令。批评者们可不客气，他们用来描述她的形容词包括：“可笑”“简直就是残暴”“荡妇的胜利”。

雕塑家保罗·莫罗-沃舍尔（1871—1936年），一位29岁的冉冉兴起的明星，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把巴黎表现为一位现代的巴黎女子——不是着古代裙装的窈窕淑女，或者希腊女神，而是满怀信心地展望新世纪、当代、自信、成熟的女人。他以有“圣女萨拉”之称的女演员萨拉·贝纳尔为模特，请帕奎因时装屋为他的作品设计了一袭最时尚的华服，成就了传奇般优雅与都市时装的奇妙结合。

结局像正式开幕式一样富于灾难性。法国总统埃米尔·劳伯特被迫在一个尚未完工、四处泥泞、到处是水坑和脚手架的建筑工地上举行旨在把共和国所有达官显贵团结在一起的庄严仪式。第一批拥进来参观这场有史以来世界上耗资最巨的博览会的游客发现许多展厅半空着。一幅当代漫画表现人群陷于脚手架和“禁止通行”标识之间不知所措的情形。漫画的标题是《世界博览会展示什么？》

其后几周，剩余的所有景点都布置好了，即便是最后到来的参展商也在众多展位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这座伟大城市那不受待见的隐喻下面，主入口处的售票厅已经建好，每小时接待6000名游客，满负荷地运行。到展期结束的时候，参观巴黎市中心这处112万平方米展场的人数约为5000万，周末期间，平均每天的游客量达到60万。

展会是一场盛大的、令人讶异的汇演，不只是商品交易会 and 科学大会，而且首先是当地及欧洲各国、美国和全世界其他各国游客的巨大露天市场。来自柏林（尽管他有一个法国人的名字，但他是德国人）的教师让·索维奇是游客之一，他在1900年第七柏林区属高中的年刊上发表的文章中，亲切地描写了他的巴黎之行的每一个细节。他于傍晚来到法国首都（“一张单程二等车票花了我69块多马克”）。这位富有进取心的教育工作者讲述了典型的游客经验，警告读者在异域旅行的沧桑：“最好到那儿

买帽子……德国的帽子意味着你的外国人身份暴露得更快……成为导游不断袭击的目标。”

索维奇适当地伪装成法国人，漫游了整个城市。名字虽然是“野蛮人”的变体，但本性上是个文明人的索维奇决心不放过任何生活细节。

两旁种植着高大树木（大多数是法国梧桐）、宽阔美丽的街道以及活跃的交通令人精神振奋。陈列不同商品的各种商店令顾客们兴致勃发。为了招揽顾客，许多店家把商品摆放在街道中间的盒子、箱子和木头支架上。这里挂着琳琅满目的衣服，那里的人行道上摆着肥皂店的货品及各色食品，一位艺术品商人在兜售古董；这边是这里的人们喜欢的新鲜绿色芦笋，那边是牡蛎和罕见的蜗牛……街面上，餐馆和百货商店的广告扔得到处都是。我带了一些回来。

大都市生活的节奏和速度令索维奇感到吃惊。这里甚至提供专门的自行车道：

街上有很多汽车。骑脚踏两轮车的人比我们少；大阿尔梅大道和其他地方有美丽的沥青脚踏车道。我特别注意到那儿骑脚踏车的人不像柏林的骑车人那样讨嫌；几乎没有柏林街上那种不断的、让人紧张的铃铛声……

那儿的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很多。柏林和巴黎的区别并不大：还是有一些马拉车和蒸汽汽车，但是有一趟开往文森森林的漂亮电车。

如果说交通跟家乡类似的话，这位老师发现其他方面的习俗大相径庭：“我发现很多小便池那样公然地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甚至公共厕所的数量也很多；皇宫附近一所房子整个长长的通道设有大量的厕所，被孜孜不倦地使用着。林荫大道上的小便池一般在广告栏周围，在这里你会读到这样的广告：烹调美食，李比希肉膏必不可少；还有白炽汽灯纱罩和裤架广告。”索维奇不得不承认这种安排有它的好处，但是当他看到一座公共纪念碑基脚处就安着一个小便池的时候，他的分寸感令他觉得愤怒。说到底，

法国人还是跟德国人太不一样了。

穿行在这些给人不和谐感的广告中，路边的一块活动广告牌上有这样一则口号：“给自己通电！”索维奇仍然狡猾地用他的法国帽子乔装身份，并终于来到了他旅程的目的地：世界博览会会场。他感觉目不暇接。他承认：“我觉得自己的笔力无法描述这个巨大工程的万分之一。”

巨大的展场从香榭丽舍酒店开始，沿着塞纳河上新修的、献给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大桥一直延伸到战神广场和特罗卡德罗宫及埃菲尔铁塔（1889年那次世界博览会留下的唯一纪念品）之间的区域，其目的就是要给人以刺激、令人敬畏和手足无措。它宣告法国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组巨大的婚礼蛋糕样式的建筑，里面是装饰、家具设计和其他各行业的殿堂（这里的每一座建筑都是一座宫殿）。

在这里，每个大国都得到一块场地，修建代表自己文化的建筑。实际上，也不是所有的大国——美国当初就被排除在最早的、河边第一批有声望的国家之外（摩纳哥倒是争取到了一个位置），只是在掀起了一场外交风暴后，其他国家才不得不放弃一部分自己的地盘，给新的觊觎者让出位置。大家觉得这再公平不过了，即便目中无人的美国总指挥官斐迪南·佩克被认为很过分：他不仅粗鲁地向东道主指出美国的贸易数字超过了法国和德国的总和，而且还放肆地说：“美国已经这么发达，它不仅有权在地球各国中占据尊崇的地位，而且应该在发达的文明间享有最重要的位置。”虽然他的法国同行在私下里怀着极大的自信说，哦，不！但是他们几乎满足了他的全部要求。

所有的国家馆都雄辩地传达了欧洲和美国的某种形象，因为除了芬兰（由一座流动的新艺术风格建筑代表）是个突出的例外之外，所有国家都选择采用其历史建筑的集锦表现自己：德国，这个无论如何必须有最高的尖顶的国家，其国家馆是哥特式风格；意大利是文艺复兴风格；西班牙是中世纪摩尔风格。英国馆则是埃德温·鲁琴斯设计的模拟詹姆斯时期风格的建筑，以布拉德福德的斯特拉特福市政厅为模型。美国选择了国会的古典主义风格——那是一座有着156英尺高圆顶的建筑，上面站立着一只金色的鹰。这些建筑表明，身份是由遥远的过去构成的，对古老的国家和新

世界都一样。

如果说过去在右岸大行其道，那么在左岸，过去则处于泛滥状态。“巴黎旧城区”是展会的一个重要旅游景点，它俗气地呈现了维克多·雨果想象的中世纪巴黎的面貌，配有炮塔（一个人被吊在炮塔外，摇来晃去）和木结构房子、一个活生生的卡西莫多、几十个少女以及用木剑互相攻击的骑士。穿着古老衣服的街贩叫卖点心和微型埃菲尔铁塔。在炮塔下面，博览会官方的巴洛克和洛可可涡形装饰则展现了另一番景象：盛气凌人、自信满满的现代主义。到处都是闪亮的机器，新的发动机和新的发明挤满了展厅。坚毅的柏林教师决心尽可能多看。他参观了能容纳2.5万人的宴会厅举行的水果展；他体验了有三种不同速度的电动扶梯；他在幻影大厅看到的幻影差点儿没让他晕过去；他参观了冶金展览，看到了世界上最大的钻石；他视察了运行中的X光机，惊叹于非洲的白蚁丘，5000只灯泡照明的“电宫”令他大开眼界，相当于3亿根蜡烛能量的探照灯令他眼花缭乱，柏林的C.弗洛尔生产的巨型起重机令他眩目（“又一个德国工程学取得胜利的领域”），给所有这些奇迹提供能源、发出小猫喘息般声音的发电机令他谦卑：“你怀着极大的崇敬看着这些巨大的机器，同时，分明感觉到脊背升起一阵凉意……这种力量一旦失控，足以把一个渺小的人粉碎成一个个的原子。”

索维奇并不是唯一一个为眼前不可思议的机器景象惊骇的人。那些机器几乎是悄无声息地运行，产生的无形力量却足以移山挪海。这些电机最热烈、最奔放、最兴奋的倾慕者莫过于美国历史学家、小说家亨利·亚当斯（1838—1918年）。当时，亚当斯从美国来到巴黎进行考察。在他的自传《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中，他把他（第三人称）对这些机器的见识视为一种宗教启示：

对于亚当斯，电机成了无限的象征。随着他对大量的机器习以为常，他开始觉得这些40英尺高的电机是一种道德力量，这种感觉类似于早期基督徒对十字架的感受。这个距他一臂之远的巨大轮子以令人眩目的速度

旋转，而只发出极其微弱的噪音——那嗡嗡声几乎不足以警告人出于对力量的敬重而离它稍微远一丝丝——它甚至不会吵醒靠着它睡觉的婴儿。同它比起来，老式的、蓄意的、每年或者每天围绕太阳公转的地球都谦逊逊色。参观还没结束呢，就不禁对着它祈祷了，这是遗传的本能教给人在面对静默、无限力量时的自然表现。在极限能量的上千种象征中，电机不像其他象征那样有人性，但是它是最具表现力的。

塞纳河对岸特罗卡德罗宫旁边的殖民地展览并不只限于法国的殖民地（法国是当时的第二大殖民帝国），但是它必须确保英国属地的风头不盖过东道国。在这里，游客可以观看各个遥远国度的居民的生活，似乎他们没感觉到成千上万双眼睛的注视，而上千颗法国人的心想到他们也是自己的臣民更加骄傲地跳动。

这是优雅的、无害的精彩世界。你可以在开罗露天剧场购物，欣赏阿尔及利亚工匠，在中国餐馆用餐，也可以参观柬埔寨宝塔，观赏愉快、满足、穿着色彩斑斓服饰的土著。法属刚果展馆的那些非洲人营养尤其好，穿着尤其漂亮。好奇的看客看见头顶大罐子的女子在葱翠的雨林植物间逶迤而行，男人们既骄傲又快乐，好像随时会放歌、舞蹈。这丝毫也没有体现他们在刚果的家乡正在发生的情况。那里正在发生着地球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种族灭绝。这场恶行是1900年博览会最珍贵的客人之一、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陛下亲自导演的。

一个国家的消失

一套二十卷的官方纪念特刊称巴黎博览会为“时代的精华”，其辉煌外观早已破碎，或者消逝，但是，它仍然以其纯粹的豪奢、无数的逸闻趣事和奇异的细节，以及它如此直白地陈说的内容和它拒绝表达的内容而引人入胜。除去官方演讲和对博爱及国家伟大的重申，展会的灿烂光辉受到

欢迎，整个展览充当了装饰华丽的地毯，掩盖了前所未有的、弥漫法国上下的灰心丧气感和巨大的社会分裂。

世界博览会呈现了一个包裹着旧时代舒服外观的崭新技术世界。在法国革命 100 周年之际，1889 年世界博览会大胆地照耀着未来，朴素的埃菲尔铁塔乃是它的标志，光束是它的传奇。1900 年，人们对大言炎炎的声明兴味索然。法国人希望分散一下精神，希望娱乐一番，不希望吃惊或者甚至震惊。

对于许多法国男女而言，新世纪不仅不确定，而且感觉备受威胁。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国家输了一场战争给德国。它承受了 1871 年皇帝拿破仑三世被俘虏并被迫逊位的屈辱，还被迫将有争议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割让给德国。更糟糕的是，法国人目睹了一个新的德意志帝国（“德意志第二帝国”）的诞生，眼睁睁看着德皇威廉一世在法国皇家荣耀的核心之地凡尔赛宫镜厅加冕。紧随战败之后，巴黎公社起来反抗为逃避德国人而撤退到外省、软弱而反动的政府。更恶劣的是，法国军队在残酷镇压了反叛、夺回巴黎以后，在一周之内，通过军法审判的方式处决了它自己的两万多公民，造成“血腥的一周”。在更晚近的 1894 年德雷福斯一案中，一位无辜的犹太军官被指控叛国罪，明显舞弊的法庭判他终身监禁，这件事引起国家中产阶级以上社会的分裂，使曾经的朋友甚至家人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这种分裂像开放性的伤口一样还在继续溃烂，因为这位诚实的上尉被孤零零地关在远离法属圭亚那的魔鬼岛遭罪，德雷福斯分子要求对他进行重审。

德雷福斯的敌人和支持者（主要是社会主义者、中产阶级和进步人士）之间的裂痕延伸到了私人生活领域：曾经的好朋友、印象派画家德加和毕沙罗因为这件事而形同陌路。作为德雷福斯的激烈反对者，德加甚至因为一位模特同情犹太上尉而解雇了她。连首都的空气似乎也分裂了。随着情绪接近沸点，1898 年左拉在《极光》上发表的文章《我控诉》总结了辩方论点：“我只有一种热情，那就是以人性为名义的启蒙热情，人性受的罪够多了，它有权得到快乐。我的激烈抗议仅仅是我心灵的呼声。让他们有胆量就（以诽谤罪）审判我，以使此事为大家所周知吧！”他没有受到

审判，但是经过几天的街头骚乱和威胁以后，他只得远避英国，等待事态降温。回到法国4年以后，由于夜间烟囱堵塞左拉在自己家里窒息身亡。他的死因被登记为事故。几年后，一位盖屋顶的人承认，他在左拉家隔壁的屋顶上工作过，出于报复作家为犹太上尉所做的辩护，他把一片木头放到左拉家的烟囱上，令他命归黄泉。

德雷福斯与衰退的阴霾

德雷福斯成了法国莫名不安感的象征。仅仅在一代人以前，法国还是无可争议的世界文化中心，主宰着全世界的时尚和各处“文明”人的音乐与文学品位。1870年，法国历史学家约瑟夫·德·梅斯特还言之凿凿、满怀流光溢彩般的信心写道，全世界的艺术家“在巴黎允许他们成名之前，都只能享有地方性的声誉……也许，在法国人给出解释之前，任何东西在欧洲都不可能得到恰当的理解”。

30年之后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伦敦成了世界金融中心；德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独步世界。法国本身受困于各种阴影，包括战争失败、领土丢失，以及亡国灭种威胁下的衰退与堕落。与欧洲其他民族相比，法国的人口处于停滞状态。1891年，法国的死亡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出生人口。如果说1850年到1900年期间人口数量没有下降（甚至从3600万上升到了3900万），那也主要归功于来自比利时、意大利和波兰的移民。在同一时期，尽管有大量人口移居他国，德国和英国的人口反而增加了20%，而哈布斯堡的臣民几乎增加了一倍，俄罗斯人的数量差不多翻了三番。法国母亲不再孕育足够的子女，更可怕的是，这个国家的男人好像也不像过去那样有能力让女人怀孕了。许多作家说，法国人似乎患了不孕症；100年内其文化和生活方式将会消失。“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之外，其他所有的问题都毫无意义，”1911年，历史学家雅克·贝迪永写道，“……法兰西之死是19世纪和20世纪最关键的事实之一。”法国落后了，而其东边的“世敌”、新德意志帝国则不仅在人口方面稳步增长，而且在科学（德国研究

者获得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超过任何国家)、军备及工业发展方面也稳步前进。法国似乎不仅仅是战败了，而且日趋消亡，日渐退入其从前辉煌的阴影之中。

为恐惧削弱、被焦躁的悲观主义情绪动摇的法国人渴望一场兴高采烈、不具威胁性的世界博览会，而他们最盼望的莫过于获得成功。主办者要求的不仅仅是视觉的大胆：回顾性的辉煌和娱乐统领一切。每个人都要对现场留下深刻印象，每个人都要好好享受——即便旧法国的纸型炮塔更像是对民族伟大华而不实的戏仿，而不是事实的证明。

并不是每个人都被光辉的表面蒙骗：“这次博览会带给我们的新东西还有待观察，”博览会的大门最后一次关闭后，法国散文家尤金-梅尔基奥尔在《时尚》杂志中写道，“1889年，钢铁（埃菲尔铁塔）勇敢地、赤裸裸地独自矗立在我们眼前；它令我们欣赏它作为建筑元素的优点。自那以后，你觉得它好像感受到人在犯下原罪之后的那种羞愧，觉得需要把自己盖住。今天，钢铁用石膏把自己包裹起来了。”

原罪就是永远分裂的德雷福斯事件。对于这个似乎已迷失方向的国家，这位犹太军官正好充当理想的妖魔。自从爱德华·德拉蒙特（1844—1917年）于1886年出版了畅销书《法国的犹太人》（1914年时已出版了200版）以来，反犹主义在民族主义右翼中十分盛行，成为了一个战斗的口号，将天主教徒和共和派无神论者哨聚在这面旗帜之下。德雷福斯特别适合作为阴谋、外国人和国际资本传说的题材。作为犹太人，他被等同于国际资本和法国传统乡村生活方式的终结；他生长在德法之间历史上素有争议的阿尔萨斯地区，因此他被怀疑对法国怀有二心、是叛徒，把他的国家出卖给人口迅速增加的德国人及其在海军服役的无数子弟。在历史本身令法国人不知所措之时，作为一名军官，他也代表着男性美德和急于洗刷失败气息的军队。如果这个国家已经没有男人能够生育足够数量的子女，那么，也许腐朽已经深入到法国的历史性伟大与男子气概的核心，军人阶层——在其发表于1899年的《梦的解析》一书中，在巴黎做过医学研究的弗洛伊德把军官与夸张的男性气概当然地联系在一起。上尉的运气差得出奇，他有着这个国家害怕和意欲仇视的一切。“对我来说，今天的法国人——

最近的一起危机已经使情况再清楚不过——肩并肩地生活在一起，做着同样的工作，分享同样的失望、同样的愉快，但是他们不再同心同德。”反德雷福斯的作家保罗·布尔热的小说《伊塔普》中的人物这样说。

法国民族主义者的口头禅是土地和死人，相当于德国人说的血液和土壤。上面这句话出自毛里斯·巴雷斯（1862—1923年）。由于他是最排外的老人俱乐部法国科学院的院士，所以这句话具有不朽的善意。巴雷斯开始写作的时候是一个典型的世纪末享乐主义者，他的纲领性小说《崇拜我》宣扬一种彻底的、唯我论的自私自利，为他赢得了相当的文学声誉。后来，这位专业自我主义者厌倦了独来独往的生活，投入到国家共同体政治之中。

欧洲政治右翼最危险的一些煽动家认为他们的政治角色根本上是审美的，服务于更高的美和纯洁，巴雷斯也不例外。像那么多转变者一样，他最厌恶的莫过于自己的过去，尤其是他曾经宣扬的颓废。他相信，天主教的法国被清教徒、犹太人和共济会阴谋腐化了，这些人破坏了“有机的团结”，而这种“有机的团结”本来应该统领由“我们的死者和我们土地的产物”团结起来的民族成员。“扭曲了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死者的每一个行为，都使我们更深地陷入令我们失去生育能力的谎言”。不育的幽灵又浮现了，这次体现为被阿哈斯威尔——流浪的犹太人阉割的乡村天主教徒。爱德华·德拉蒙特在他的畅销书《法国的犹太人》中写道：“一切都出自犹太人，一切又回到犹太人。”

反犹太主义是德雷福斯案的显然动机，人口争论也起了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者雷内·戈纳尔等批评者迅速抓住民族衰退的假定原因：城市生活、缺少信仰、普遍的悲观主义、资产阶级颓废的过度文雅，以及“吃人的”大城市里尤其明显的现代生活的其他特点。这对世界上最具有教养的国家——法国的打击尤其严重，戈纳尔警告说：“恰好我们的法国文明及其律法和习俗夸大了这一影响，迫使人真正害怕人口下降。”尽管采取了各种反向的措施，尤其是取消堕胎（在维希政权统治期间，这是死罪），甚至不准做避孕套广告——当时出现在其他国家报纸上的“绅士们的橡胶制品”。

即便德雷福斯的捍卫者埃米尔·左拉在受到触动之下也写了一部题为

《繁殖力》的小说，对比了两对夫妻的命运：自我本位、富裕的城市居民把一切都投入到他们唯一的儿子（当然，他死了）身上，而故事核心的主角夫妇则选择了简单的生活，生育了一堆孩子，结果得到了爱和满足。这篇小说左拉构思了好几年。早在 1896 年，他就在《费加罗报》上撰文说：“我的小说……将是一幅巨大的壁画，解释巴黎这样的城市如何杀死病菌，吞噬生物，消耗堕胎才成了这个样子：明天的生活之地。”

城市怪物的形象——瞪着闪着电光的眼睛，石头和钢铁做成的身体，没有寄生虫，更谈不上生命，这种怪物以无法餍足的饥饿吞食其居民，就像直接回归到用自己的孩子烹煮盛宴的疯狂的神萨图尔努斯（罗马神话中的农业之神），这个造成毁灭的创造者一样。作为邪恶之地的大都市——昭然若揭的资本主义吸血鬼正在吸食那些被它吸引的人的血。

这种政治态度对于 1900 年世界博览会的艺术及其表现有着强烈的影响。巴黎大王宫和巴黎小王宫这两处真正宏伟的展厅（这两个展览遗迹现在在巴黎仍然可以看到）是为了体现法国的光荣而建来举办艺术展览的。展览期间展出的大多数作品都遵循世纪之交法国艺术的正式美学：学术性很强的东西——石膏和大理石、青铜和油画表现英勇的裸体、感伤的壮丽和纯洁的美女。只有一小批展品奏响了不同的音符，如此的不同，以至于总统劳伯特准备进去的时候，一位保守的艺术评论家挡住他，大声说：“别进去，总统先生，那里面装着法国的耻辱！”那是“激进派”的展览，由艺术收藏家罗杰·马克斯担任馆长。可耻的秘密是高更、瑟拉、塞尚、毕沙罗、毕加索、马奈和莫奈的作品，是堕落的艺术。

法国艺术的活力主要来自一种库存盘点和回忆感。最著名的是，这种对过去世界的回顾性个人重建体现于巴黎优雅舞台中心的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作品《追忆似水年华》上。远离劳工阶级生活的残忍和小资产阶级焦虑的自私，普鲁斯特和他圈子里的人过着美妙的生活，享受着由一系列优雅沙龙、舞会和附近的布洛涅森林远足构成的慵懒奢侈，布洛涅森林是一个真正优美的世界（至少在其居民心目中），它的范围只有几平方公里，位于布瓦、协和广场与首都右岸宏伟、浮华的巴黎歌剧院及蒙梭公园之间。